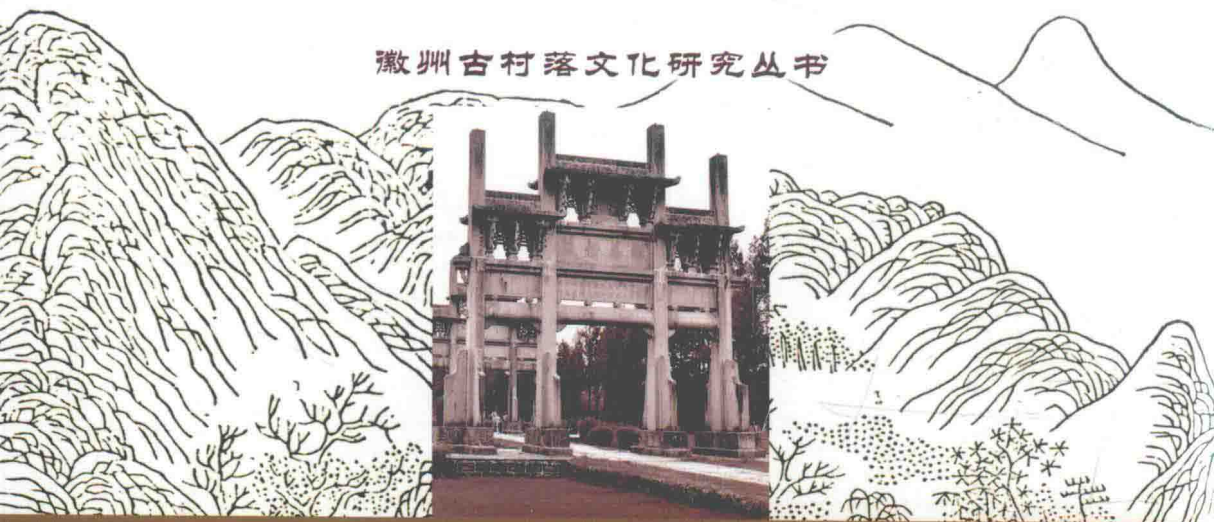


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丛书



HUI ZHOU YAN SHANG WEN HUA YAN JIU

徽州 盐商文化研究

以棠樾为例

江巧珍 孙永平 著

合肥工业大学

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丛书



HUI ZHOU YAN SHANG WEN HUA YAN JIU

徽州 盐商文化研究

——以棠樾为例

汪巧珍
孙承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盐商文化研究:以棠樾为例/江巧珍,孙承平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650-3251-6

I. ①徽… II. ①江…②孙… III. ①盐业史—研究—歙县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049 号

徽州盐商文化研究

——以棠樾为例

江巧珍 孙承平 著 责任编辑 张 慧 王钱超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9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155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251-6

定价: 29.8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众所周知，徽州商帮中，盐商是中坚力量，而在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中，以歙县盐商势力最大。民国《歙县志》说：“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歙县志》里提到歙县的十四个盐商家族村落，我们多次去进行考察，现在的文化遗产十不存一，保存最完整的是西乡棠樾村。我们从棠樾七座牌坊下走过时，总感到不是“忠孝节义”的简单排列，而是一定存在更深层次的起因。30年前，对徽州文史有独特见解的舒征灌先生告诉我们，清代立牌坊，要得到皇帝的御批，打通关节所花的银子要比建造牌坊的造价高得多，这种代价只有大盐商才能承受，因此歙县的牌坊大多是大盐商出钱为家族立的。这就无意中给我们列出一个课题——徽州盐商文化。带着这个课题，我们在歙县采风时发现牌坊多的村子，在清康乾盛世时几乎都有族人是大盐商，如现存五座牌坊的雄村、郑村、许村、洪坑村等；被誉为徽州凯旋门的许国八脚牌坊，也是盐商世家立的；拥有第二牌坊群的稠墅村的汪廷璋，乾隆年间担任过两淮总商。棠樾村的鲍树民先生认为，棠樾的牌坊群就是大盐商鲍志道设计和修建，由鲍漱芳完成的。但是在歙县现存的101座牌坊中，与“盐”直接有关的牌坊只有棠樾“盐运史司鲍漱芳”的“乐善好施”坊。这也是徽州盐商文化的特殊性之一，把“业盐致富”隐去，只显示“忠孝节义”。正是这种特殊性成为激起我们收集徽州盐商的资料的动力。我们曾收集到几本清代徽州盐商个案的手抄本，如歙县渔岸村余氏盐商的《疏文誓章稿》、岑山渡村程氏盐商的《淮北盐商程德中公文汇抄》、同治元年（1862）休宁上溪口村洪氏盐商的《分家阄书》、同治九年（1870）祁门永馨盐酱店《合同存底》和歙县江村的《二房资产清簿》等。我们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在《清史研究》上

徽州

001

发表了《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徽州盐商兴衰的典型个案》、在《徽州文化研究》上发表了《〈从浮价病民案〉试析嘉庆中期徽州盐商衰退的原因》等文章。另外我们还注重对徽州宗谱的收集和研究。

黄山学院原党委书记汪良发先生在“徽州谱牒：家族与社会”国际研讨会上说：“谱牒是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文化，它不仅承载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姓氏、宗族、世系等，而且也展示了人口、族规、族约、土地关系、教育、生产、生活、民情风俗等发展情况，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古徽州是特别重视宗法制度的地区，各姓各族，十分重视修撰宗谱。徽州留下的谱牒之多，是全国少见的。要说研究徽州文化，这是一大富矿。”中国现存的各类谱牒中，徽州的族谱数量最多，也最富有研究价值。族谱是“家之大典”，与祠堂祭典一样重要。徽州的谱牒中汇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其他文献中没有记载或者是失传的。徽州的谱牒经过历年的损毁，大多数已不存世或成了孤本，例如笔者所在的歙县桃源坞济阳江氏宗谱，只知安徽省博物馆 1964 年从族人手中征集到一套。20 世纪 90 年代《历史大观园》曾刊登许宗元的一篇文章，说这套谱记载有新安画派鼻祖浙江的世系。所以《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成了笔者梦寐以求的宗谱。近年我有幸收集到四册《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其中《送运长少溪江公入覲序》和《赠大嵯伯少溪江公序》记载了万历后期盐法崩坏之时，入闽盐商“惨莫聊生，十九逃亡，以至仓如悬磬，帮若晨星，公私交困，盐政弊坏”的状况，以及江少溪治理福建盐政有功绩，受到入朝觐见万历皇帝的嘉奖等情节，是研究明代盐政的重要史料。如果说新安画派的浙江、江注出自盐商家族，那么另一位画家程嘉遂也和盐商家族有关。据我们收集到的《歙西长翰山程氏宗谱》记载，程氏家族的程新阳，经营浙盐，与程嘉遂父亲交往厚善，每过吴，都要程嘉遂在家中小住；清代程财源，经营淮南盐发财后，和姻亲洪坑的洪日晖，出资重修程氏宗祠等。这说明在明清两代，盐商们致富后打牢家族的经济基础，为家族文化事业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新安画派中有的本身就是大盐商，如著名画家李流芳等。至于收藏善本书籍、名人法帖的盐商更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盐商文化。

盐商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力宣扬祖上的鸿儒名宦、忠孝节义，

而对于业盐成巨富的过程很少述及。前述的歙县现存的 101 座牌坊是这样，棠樾鲍氏的几种宗谱的记载也是如此。鲍荣的七世孙鲍永高（1197—1271）在南宋末年开始收集鲍荣之后可考的资料，宋开庆元年（1259）编著棠樾鲍氏的宗谱。由于鲍永高收集祖先资料时认真仔细，编著宗谱时一改“攀附显贵”等弊病，把鲍荣之前不太可靠的传说剔除，因此棠樾鲍氏三族的宗谱资料是比较详细和可靠的。笔者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十四世孙鲍光纯主编的《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20 册 200 卷），将鲍荣支下与迁派的棠樾、蜀源、岩镇三地的族系全部收录，成为一部完整介绍棠樾鲍氏三族系列史料。鲍氏在棠樾的一族枝叶茂盛，分成许多支派，如鲍居美有二子鲍汉、鲍泳，分成汉公派和泳公派；鲍泳之下又分成寿孙派和万四公（庆云公）派；万四公之下又分成珪公派和衢公派；珪公派下分成相童、铁童、继善、宗庆、助庆、文庆、隆庆、瑞庆、福得、民得、祖荣、敦善、家善、万善等二十派；万善公派之下更是人丁兴旺，有若松、若梅、象贤等 21 个曾孙。这些支派大部分外迁，在棠樾本里居住的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30 年后的嘉庆初年棠樾的大盐商鲍志道和族侄鲍琮（学坚）编纂更能体现棠樾本里鲍氏的族谱《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此谱是支谱，宗 16 世祖鲍象贤为支祖。这两种宗谱是笔者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也是棠樾鲍氏盐商留下的文化遗产之一。

棠樾鲍氏留下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其主要原因：一是大盐商鲍志道鲍启运兄弟是穷苦出身，了解世道的艰难，在最富裕时不奢侈挥霍，把大量的资产转移到宗族资产和文化事业上；二是他们是在盐政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急流勇退，逃过使大多数盐商遭到灭顶之灾的劫难，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留下典型的盐商文化村——棠樾。

笔者还注意对有关棠樾的文书资料特别是手抄本的收集。徽州手抄本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深受历代文学家、学者与藏书家珍爱。因其仅靠亲笔抄录，底本较其他各类善本更为稀少，加之社会动荡、天灾、战乱、文化浩劫等因素破坏，存世之量真如凤毛麟角，是徽州历史上的“文化标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原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几十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契约文书陆续被发现，其中包括徽州各种手抄本，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发展且传承沿用于古徽州六县境域内一种自成体系的草根形式的原始记录。由于手抄本是可遇而不可求

徽州

003

的，收集起来除了拥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和鉴别能力之外，全靠脚勤和运气。笔者曾收集到几本清末民初有关棠樾鲍氏的手抄本，如道光年间《鲍氏元宵会簿》、鲍集成编著、盐商鲍漱芳校订并写有序言的《疮疡经验》、民国年间抄本《岩镇鲍氏宗谱》和《鲍桂星年谱》等，特别是棠樾村鲍鸿的《楹联汇稿》是鲍鸿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歙县西乡的庆吊、社戏所作楹联汇集，大部分楹联前有引言。

楹联既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更是社会现象的一种舆论。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楹联反映着一定时代的民心民意，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舆论，甚至反映政治变迁的趋势，表达了某种蕴含着真理的内容；它以工整对仗的文字形式，寄寓了严肃的政治思考。楹联对于社会文化现象做出直接快捷的反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它代表了民间的意识形态，蕴含了民众的政治心声。《楹联汇稿》是歙县西乡清末民初时期反映徽州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的民间艺术，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深刻的教育价值和较高的审美价值，也是棠樾鲍氏留下的文化遗产之一，值得分析和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歙县盐商村落的兴起和族神崇拜	(001)
一、歙县西乡的水利工程为徽商提供了原始资本	(001)
二、歙县的盐商村落概述	(004)
三、徽商兴起和族神崇拜的关联	(008)
第二章 棠樾村的选址要素考证	(015)
一、棠樾的建村历史和命名考证	(015)
二、天人合一的风水观是徽州村落的选址要素	(017)
三、依山傍水的徽州村落	(018)
四、吉处安居、风水佳地的棠樾	(021)
第三章 棠樾鲍氏宗族与历修宗谱综述	(025)
一、新安鲍姓的源流考	(025)
二、《重修棠樾鲍氏三族宗谱》述略	(028)
三、棠樾盐商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	(032)
第四章 棠樾鲍氏宗祠和祠祭的特殊性	(035)
一、棠樾的鲍氏宗祠考略	(035)
二、敦本堂和祠规三则	(037)
三、特殊的世孝祠和清懿堂(女祠)	(041)
四、棠樾鲍氏祠祭的特殊性	(044)
第五章 慈孝传家、鸿儒名宦的棠樾鲍氏家族	(049)
一、慈孝两全、御笔题赞是棠樾鲍氏立族要素	(049)
二、业儒卫道是棠樾鲍氏的立族基础	(052)

三、名宦位重是棠樾鲍氏进入盐商行列的阶梯	(055)
第六章 经商业盐、富埒王侯的棠樾鲍氏家族	(060)
一、累世经营盐业的鲍氏家族	(060)
二、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两淮总商鲍志道	(063)
三、在“盐海”中急流勇退的鲍启运	(068)
四、棠樾鲍氏盐商“脱贾入儒”	(071)
第七章 举世闻名的棠樾牌坊群古今考	(074)
一、牌坊的衍变和功能考证	(074)
二、元明时期棠樾的牌坊存毁原因	(076)
三、盐商完成的棠樾牌坊群	(079)
第八章 棠樾的古民居	(085)
一、棠樾古民居的特色	(085)
二、棠樾前街的古民居	(087)
三、棠樾后街的古民居	(089)
第九章 棠樾的徽州文化遗存	(093)
一、棠樾鲍氏盐商和《安素轩法帖》	(093)
二、鲍集成、鲍漱芳和《疮疡经验》	(096)
三、鲍鸿的《楹联汇稿》和西乡逸事	(098)
附 录	(109)
徽州盐商兴衰的典型个案	
——歙县江村江氏《二房资产清簿》	(109)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	(113)
从“浮价病民案”试析嘉庆中期徽州盐商衰退的	
原因之一	(127)
参考文献	(134)
后 记	(135)

第一章 歙县盐商村落的兴起 和族神崇拜

一、歙县西乡的水利工程为徽商提供了原始资本

歙县是富甲天下的徽商故里之一，歙县的西乡为盆地构造，土质肥沃，是古徽州最富饶的地域。发源于黄山南麓的丰乐河流经西乡盆地，河床豁然开阔，东汇入练江，环绕歙县县城后在浦口处汇入新安江。丰乐河两岸的绿荫中掩映着粉墙黛瓦的古民居，分布着呈坎、潜口、竦塘尾、琶村、石桥、西溪南、长龄桥、岩镇、塌田、唐模、棠樾、蜀源、稠墅、郑村、西溪、潭渡、黄潭源等古村落。历史上歙县西乡人文荟萃，名胜古迹星罗棋布，现存徽派古建筑 3000 多处，被誉为古建长廊。世界闻名的棠樾牌坊群就是这条古建长廊上最璀璨的明珠。

歙县西乡的富饶除了得天独厚的肥沃土质外，还得益于早期的水利工程——塌的兴建。乾隆时期歙县西乡人黄宗羲，在他所著《古歙乡音集证》中对“塌”的乡音和字义作出明确的考证：“塌，本言杰，乡音惠。俗谓壅土导水以灌溉田曰作塌。《说文》：堰也，以土障水也。《魏志》：治吴塘诸塌以溉稻田。”所以塌是一种引水堰坝，大河上的塌一般用岩石建成拦河坝，将河水斜向截断，坝体上一般建有外塌口和内引水塌口。外塌口用于航运，内塌口用于灌溉。洪水时，大部分水越坝而过，可及时泄洪；枯水时，水位被挡水坝抬高，保证了内塌口的自流灌溉用水。多座塌的修建，使得丰乐河西乡段的两岸成为旱涝保收的自流灌溉良田庄园。有的村子干脆就用塌来命名，如昌塌、塌田、富塌等。

据史书记载：东晋咸和二年（327），鲍宏在丰乐河上的岩镇下段建鲍南塌，这是徽州见诸文字最古老的引水灌溉工程。原塌坝长 160 丈，分南、北支渠引水，共灌田 3700 亩。鲍南塌历时 1600 余年，得以沿用到今，历代重视维修管理是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

001

吕塌建于梁大通元年（527），是徽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位于丰乐河西溪南村下段，由新安内史吕文达同妻兄率村民所建。塌坝高5丈许、长20余丈，分南、北两渠引水，南渠灌田1万余亩，北渠倍之。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采石改筑石坝80余寻（每寻8尺）。乾隆十九年（1754），洪水毁坝，渠道淤塞，半数水田沦为旱地，经修复后，北渠仅灌田3187亩，南渠灌田1600亩。嘉庆四年（1799）重疏南、北渠。咸丰元年（1851）渠道复淤，郡人宋达秀倡议重修，经营7年，始告成。

雷塌坐落在丰乐河西溪南上段，南宋祥兴元年（1278）由程迁率子8人开筑，清咸丰末年淤废。同治三年（1864），由程永和倡修，历时五年竣工。干渠1条，支渠分四圳，迂环5千米，直至岩镇下临河村，灌溉农田1700亩。

昌塌坐落在富山村上村头的丰乐河上。南宋绍兴年间富山余希亮、莘墟吴大用合两族人之群策群力建成。引丰乐水，经谷山、田干、里干、莘墟、田里至余家山，灌溉农田3000亩。现在莘墟村还保存着“大用公祠”，它是吴代祭祀开凿冒塌的先祖吴大用的公祠，也是管理冒塌水务、处理水事纠纷的场所。

条龙塌，入口在丰乐河上游琶村，明正德元年（1506）西溪南吴姓开筑。内有干渠1条，长1千米；支渠2条，长4千米；斗渠45条，总长50千米，灌溉农田3000亩。

上述统称丰乐河五大古塌。



棠樾大姆塌

各古村的家族还在各支流上修建水利工程，如西溪南吴氏在灵金河上修建了大、小姆碭；唐模许氏在檀干溪上修建了高阳碭；明代初年向杲的鲍时昌，捐资开筑燕坑石碭，在小溪上形成长塘，后人以长塘鲍氏自称。以牌坊群闻名宇内的古村棠樾，其鲍氏家族元代就在丰乐河支流建大姆碭，灌溉农田 600 余亩，为棠樾鲍氏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农业经济基础。

由于拥有这样的水利资源，使歙西西乡盆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粮仓，这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山区，是农耕经济发展难得的条件。丰乐河流域的各种水利工程，除了自流灌溉之外，还有以下几大功能。

其一是改善了村居环境。内碭口的自流灌溉渠一般利用落差流过村中，解决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美化村容，调节小气候。歙县西乡古村落之所以具有天人和谐的无限魅力，成为当时最佳的人居环境，是因为当地人在环境选择、顺应自然、亲和山水方面的自觉意识。流过村中的水渠还提供了充沛的消防水源，为木结构的古民居提高了预防火灾的能力。完善的村落人工水系和农田灌溉系统的有机结合，使村中的生活污水用于灌溉，既节约又统筹使用，实现了水资源的再利用和动态平衡，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朴素的循环经济的体现。

其二是提供水能动力。据史料记载，中国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水碓，它是利用水力舂米的机械。这项技术随西晋永嘉之乱后的第一次移民潮带入新安郡，也就是古徽州的前身。水碓的动力机械是一个大的立式水轮，轮上装有若干板叶，每座碭的靠河岸一侧都有引水口，引水口的水冲动大的立式水轮上的板叶，使立式水轮转动。水轮的横轴上穿有四根短横木（与横轴成直角），旁边的架上装有四根舂谷物的碓梢。当横轴上的短横木转动时，就能碰到碓梢的末端，将之压下，另一端就会翘起，短横木转了过去，翘起的一端就会落下。四根短横木连续不断地打着相应的碓梢，每个碓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杆，杆的一端装一块圆锥形石头。下面的石臼里放上准备加工的稻谷。流水冲击水轮使它转动，轴上的拨板臼拨动碓杆的梢，使碓头一起一落地进行舂米。利用水碓，可以日夜加工粮食。水碓除了加工粮食之外，配上其他的装置，还可以加工茶叶、造纸、榨油、缫丝等。直到 20 个世纪 60 年代后，丰乐河流域的水碓才全部为柴油机和电动机所替代。

其三是保证了歙县西乡物流的运转。丰乐河流域的各种水利工程使丰乐河流域提高了水位，使得水利运输日渐繁荣，并不受季节的影响，从而保证了歙县西乡物流的运转、财富的积聚。这些水利设施为这条古建筑长廊的兴建提供了财力保证和建筑材料运输的便利，修建古民居和牌坊的建

徽州

003

筑材料就是直接通过这些溪埭运输。徽州在明代以前的建筑石料，主要是利用当地产的白砂石，这种石料开采容易，价格便宜，但是容易风化，建造的牌坊不容易长久保存。所以在清代以后，高档建筑石料大多采用产于浙江淳安茶园的青石，又称状元石，颜色微青，石质坚硬，不易雕琢。这种石料豪华美观，历经几百年不易风化，价格要昂贵得多，但对于富可敌国的徽商特别是盐商来说，只要能保持建成的祠堂、牌坊能华贵坚固，多花银子他们是不在乎的。开采下的茶园青石，用大船运到渔梁坝下，再载在中、小船或专用的竹筏上，利用人力拉纤的方式拉过各座大小溪埭的豁口，然后运到各村落的近处上岸，最后用人拉肩扛的方式运到建筑工地，省力省工。今天在探寻棠樾牌坊群形成的原因时，我们可能想不到，要一直追根溯源到这些如今已经破败渐消的古代水利设施。

研究徽商时，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徽州人外出经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弘治《徽州府志》称：“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粮食长期不能自给，明代徽州“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在无法有效满足起码温饱的情况下，徽州人很早就走上了外出经商谋生的道路。相对比而言，丰乐河水和肥沃的盆地土质使歙县西乡成为徽州地区不多的产粮区，农耕经济为西乡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原始资本。

二、歙县的盐商村落概述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苏、沪、杭，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国。所以张海鹏等学者认为，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应该从明代中叶开始。而这时期徽商经营的排位第一的商品就是人人都离不开的食盐，徽商中最突出的就是富埒王侯的徽州盐商。徽州大盐商的发迹史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经过祖上几代辛勤务农，积蓄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然后利用境内新安江、青弋江等水系的自然运输优势，将徽州的茶、

木等产品沿江而下，贩卖至江南、淮扬等商业繁盛之地，积累起真正的商业资本，然后抓住明代开中制的时机进入盐商的行列。

明初，已具备一定经商基础的徽州商人，由于朝廷的需要，迎来了新机遇，催生了徽州盐商的发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征用了大量兵丁充实到边防戍守，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提高商人运送军粮的积极性，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凭借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往边地输送军粮，然后按价付给经销食盐的准销证——盐引，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盐是朝廷严格控制的利税商品，销路广，利润高，经营盐业肯定是财源滚滚。聪明的徽商开始到南方收购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再雇骡马拉到长城脚下，换取盐业销售许可证。及至后来，徽商为节省运送费用，干脆雇人在长城脚下垦荒，直接供应长城脚下的戍边队伍。这时期棠樾鲍氏经营盐业的较早记录是运粮到云南贵州换取浙盐盐照。

据清乾隆版《重编棠樾鲍氏三族宗谱》记载，棠樾鲍氏十二世祖鲍汪如（1346—1422），字思齐，号安素，少年时好读书问学，作律诗时多有奇句，受到同人的称扬。他长在元末战乱中，壮年时即明洪武年间，游学四方，交结士大夫，声誉更加著名。当时云南贵州边境有战事，按明朝初年的惯例，招募商民运送军粮以供军需，换给盐照。鲍汪如筹借资费购米运到云南贵州边境，换回盐照，拨浙江温州南场支盐。当时进入云南贵州的粮道，主要是水路，其中有一条水路就是经长江进入湘江，经沅江进入湘西，再经沅江的支流清水江进入贵州。明初的开中制促使徽商进入云南贵州，同时军屯中徽州移民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屯堡是汉族文化的“活化石”，是世界上最后的明代古村。它既保留了徽州先祖的文化传统，又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明。贵州的屯堡文化和徽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两个实例可以证明这种关系：一是明初徽州汪华的后裔奉诏入黔屯兵安顺场一带，尊唐代越国公汪华为族神，和其他姓氏入黔屯兵的徽州移民六百多年来一直延续着“抬汪公”一类“汪公会”的民俗活动，至今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有特色的“非遗”项目；二是被誉为贵州“大明屯堡第一屯”的鲍家屯，就来源于徽州歙县棠樾的鲍氏后裔。据鲍氏家谱记载：明代开国皇帝在贵州安顺一带实行“屯田、养兵、守土”政策时，鲍氏始祖鲍福宝（任军职都司）带领官兵选择杨柳湾——今鲍家屯创建屯军农垦基地，繁衍子孙后代，现在鲍家屯已发展成600余户2000多人的村寨。又据《徽州府志》记载：鲍伸原籍青州，到了公元四世纪初，青州大乱，鲍氏子孙进入江南，其中就有一部分跟随鲍伸进入新安。鲍伸是武将，会拳术，称为鲍家拳。晋太康



年间（280—289）护军尉鲍伸，镇守长安，练就鲍家拳，后将鲍家拳由北方带到安徽歙县。洪武二年（1369）鲍福宝又将鲍家拳由歙县带到贵州鲍家屯。如今贵州的鲍家拳 108 套徒手、棍、单刀、双刀、枪等已经在鲍家屯传了 22 代，在明清两朝，方圆几十里的屯堡村寨，武功数鲍家屯最强，故有“吃酒吃肉九溪坝，拳打脚踢鲍家屯”之说。此是近年贵州鲍家屯寻根到歙县棠樾传回的信息。

到明朝社稷大定时，粮草充裕，戍边的将军开始改收粮为收钱。这是明朝军方最初的腐败，却又给精明的徽商带来更大的机遇。拿钱就可以买到盐业准销证，方便灵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闲居在内宫的太监和嫔妃嫔娥，面对盐业的巨大利润诱惑，也心痒难耐，可是又不方便出去，就想出了投资、操纵的方式，一帮精明的徽商通过徽州的京官介绍被找了来，成为太监嫔妃的委托管理人，因为是利益共同体，太监嫔妃对于自己的委托管理人自然是大力抬举，善于利用谋略的徽州盐商，利用政治交易背景，促成了独特的徽州盐商。

徽州盐商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且以“盐荚祭酒甲天下”而闻名海内。据佶山著的《（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五》介绍，“盐荚祭酒”这个身份相当于清代的总商，地位十分重要，“散商分隶其下，一切纳课、杜私，按名责成”。这时山西、陕西的盐商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文化品位上也屈居于徽州盐商之下。万历四十四年（1616），御史袁世振整理两淮盐务，为疏销历年积欠的盐引，推行纲盐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每年派行新盐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盐引原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其它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州盐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于是随着纲盐法的推行，他们把持两淮盐业的特权便固定下来。所谓两淮盐业，是以淮河入海口为界，在淮河以南谓之淮南，在淮河以北谓之淮北，此处所谓两淮并非指淮河全流域的南部与北部，而是专指淮河入海处的海盐产区。淮南盐业的集散地在扬州，销盐的盐岸是长江中下游和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淮北盐业的集散地在淮安，盐岸是皖、苏、豫三省淮河两岸共计四十二州县。相对于淮南而言，淮北的盐业无论是规模与引岸都要逊色得多。

明清时期称雄于东南半壁江山的徽州商帮，以盐业为“龙头”行业，而在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中，以歙县盐商势力最大。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歙县西乡的竦塘的黄姓、潜口的汪姓、丰南的吴姓、长龄桥的郑氏都

是盐荚祭酒甲天下，积累的盐业利润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两白银。如万历二年（1574）长龄桥郑景濂到池州营商谋生，在积攒了若干资金后，万历四年到扬州从事盐业。他在竞争中胜出，逐渐成为一位拥有相当身价的大盐商，歙县老家的亲友纷纷前往投靠，到晚年“食指以千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盐商家族。

又如由棠樾邻村槐塘程氏分出的岑山渡程氏，在清代康熙年间曾产生过数名两淮盐务总商。据《新安名族志》记载：“程 歙县……岑山渡在城南十五里。前有河，河中流屹立者为岑山，因名岑山渡。系出太守元谭公裔、四十一世曰云卿，自槐塘上府出继大呈村。四十三世曰诚，再迁岑山渡。诚生五子，曰月，曰怡，曰梅，曰英，曰童。”岑山程氏五房中有一支迁两淮盐商聚集地扬州。据《新安程氏世谱》卷十五《年表·新安汾公派》载：岑山渡叔信公（诚）子慎吾公为迁扬州始祖。他的五个儿子上慎公（量入）、蝶庵公（量能）、青来公（爽）、阿平公（量衡）、莲渡公（量越）都是盐商。不但如此，他的子孙也大多是盐商，有的还成为总商。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人物·才略》载：（徽州盐商程量入）程上慎为淮南盐务总商，他的长子程之謨，为“商总二十年，康熙十三年间，军兴旁午，商众捐资助饷，悉取办于之謨。三藩平，御史郝浴上其事，优叙者三十余人，之謨特赐五品服，为诸商冠”，其中第五子程量越是迁淮安的始祖。而淮安是淮北引盐的集散中心。徐珂《清稗类钞·豪侈类》里这样描写淮安：“清江浦为南北孔道……距二十里即湖嘴，乃淮北盐商聚居之地。再五里为淮城，乃漕船所必经者。……有徽人汪已山，侨此二百年矣，家富百万，列典肆，俗呼为汪家大门。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唯与北商程氏互为陈朱而已。程氏有字水南者，以名翰林隐居，有曲江楼、菰蒲一曲获庄诸胜，诗画皆臻绝诣。”总之，岑山渡程氏是两淮盐商中的重要一姓，从总商、中小盐商至各级员工，从运商到岸商到各镇的分销点，都有程姓子孙的身影。岑山渡由于在新安江的边上，是较大船舶岸的埠头，歙县西乡的盐商家族，如南溪南之吴、稠墅之汪、棠樾之鲍、疎塘之黄及西南乡黄备之张、韶坑之徐、皋径之萧江、渔岸之余等，大多在此上船或经过此地到杭州后经大运河到扬州、淮安等地，因此此地又是歙县盐商的出发地之一。这些歙县的盐商家族逐步垄断大江南北盐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给家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清代乾隆年间建立总商制度，扬州的八大总商，歙县盐商就常占其四。唐模村的清代翰林许承尧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

徽州

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歙县各姓总商中，西乡的超过半数，如“丰溪、澄塘之吴”的丰溪，就是指丰乐河上游两岸西溪南、石桥、莘墟等村吴姓家族；澄塘也是西乡的吴姓家族的聚集村之一；“潭渡之黄”的潭渡就是近代新安派画家黄宾虹的家乡，在丰乐河下游的北岸；“稠墅、潜口之汪”“郑村之郑”“唐模之许”“棠樾之鲍”的稠墅、潜口、郑村、唐模、棠樾等都是歙县西乡的著名盐商村落。乾隆时期，歙县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烜赫一时的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两淮总商，其中除了江春是属北乡江村外，汪应庚的潜口村、汪廷璋的稠墅村、鲍志道的棠樾村都是属于歙县西乡村落。业盐成风甚至在西乡方言俗语中也有所反映，《古歙乡音集证》中，“性命值盐换的：俗谓人轻视性命云云，然此语亦省出。今仪真盐所掣摅，抬盐上长跳高桥或有坠跳致死者，即以所抬之盐一引偿之，亦旧制也”就是例证。清乾隆时歙县西乡人吴梅颠《徽歙竹枝词》：“盐商嗜义自来多，桑梓亲朋年好过，竟有炭资（盐商富人例于年终量亲疏厚薄馈赠之名）嫌不要，拼来质库典神铎。”这说明盐商致富不忘乡里的事例是普遍的。

歙县西乡村落的繁华都来自于当地盐商富可敌国的雄厚财力，西乡的盐商家族还通过联宗、姻亲、世交关系形成盐商集团。以前研究徽州盐商的论著认为，徽州各村的盐商总是极力维护本族本支的利益。事实表明，这只不过是一个方面，实际上世交、姻亲也在维护亲戚的经济利益，当然，这种帮扶是建立在互惠、诚信的基础上的。这种以宗族为根基，以世交、婚姻为纽带结成的盐商集团，得益于明清时期的盐政，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财力在自己的家乡修建深宅大院，扩建祠堂家庙，捐修书院文会，广置义田学田，出资为自己家族的孝子节妇、忠臣义士请旌树立牌坊，从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盐商文化村落，其中最典型的盐商文化村之一就是棠樾。

三、徽商兴起和族神崇拜的关联

天时、地利为徽商所有，人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徽州村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观念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